



闽东畚族歌谣集成

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

肖孝正 编纂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东畬族歌谣集成

肖孝正 编纂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闽东畲族歌谣集成

肖孝正 编纂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5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闽东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北路15号 邮编: 3521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4.75印张 4插页 350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80534-805-7

I·700 定价: 13.3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

顾问：陈济谋 吴敦诚 雷锦灼 郑仲腾 张 越

组 长：林思翔

副组长：江小源 吴丛嵩 蔡文青（常务） 蓝运全

成 员：王胜学 雷木生 黄德辉 翁景秀

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

主 编：蔡文青

副主编：肖孝正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成崇 马树霞 刘松年 余 挺 肖孝正

汤 滔 李晓云 吴成良 吴昌铸 邵汝良

陈永雄 郑万生 钟孟恭 郑锦明 龚 焰

章庆和 黄昌朝 蔡文青 蓝兴发 蓝振河

雷德和

办公室主任：肖孝正（兼）

畬族文化

永放光彩

陈增光
一九九三年二月

中共宁德地委书记 陈增光题词

聽政于謠
察民心聲。

湯金華

九二年五月一日

增強民族團結

紀念祖國光榮

鍾雷興

五十年有

張氏尚文學集
成爲兩個文明
版

陳濟謀



丙午年春

中共寧德地委委員、宣傳部長 陳濟謀題詞

高歌
唱响
时代

林思翔
九一

论畚族歌谣

(代序)

肖孝正

畚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56个兄弟民族中一个成员。畚族歌谣，伴随着畚族社会历史的进程传承至今，是畚族人民历代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它涉及多种学科，历来尤受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所青睐。它直接关系畚族社会历史方面、文化艺术方面的诸多课题，有的至今学界仍在调查和研讨之中。

多年来，我在闽东畚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工作中，学习和采录畚族歌谣，多次参加畚族祭祖、婚礼及歌会歌节等活动，了解畚族民俗风情，征集各地资料，编就《闽东畚族歌谣集成》。写个学习和采编畚族歌谣的体会汇报，略陈己见呼！不揣浅陋哉！

畚族歌谣称谓考释

畚族人自称“山哈人”，畚语自称“山哈话”，畚族歌谣自称“山哈歌言”。“歌言”指“诗歌”或“歌唱”，如歌词：“山哈歌言几千年”、“哪个朝代禁歌言”。

山哈歌言是畚语音shang hā gōu yēn译成，两词在汉文史籍词典从来未见。畚族是被称。汉文史籍上“畚”字，同“𡵓”，音yū，又音shē，由奢音义演释为刀耕火种的山民，即畚民；宋元明又将畚民释演对这一民族的外称。“畚”从《易·无妄》：“不耕获不菑畚。”《诗经·周颂·臣工》

“亦又何求？如何新畲。”至唐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之九：“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宋王禹称《谪居感事》：“畲烟浓似瘴，松雪白如梨。”“畲”字的字义均指刀耕火种或诗诂“一岁为蓄，二岁为畲，三岁为新”，并非指一个民族。《中华大字典》1978年10月第一版（编成于1915年出版48000余字）只见畲字，畲：音奢，火种也。

“按广东旧潮州府属有畲蛮，号百家畲，其人刀耕火种，因以畲名……字或作畲。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新语》字均作畲。”其“百家畲”中有畲族先民，只“字或作畲”。刘克庄《漳州谕畲》：“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和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率民群聚……”其义看来，还是指刀耕火种的“百家畲”，当然也包括畲族这段历史的这一族体。应当明确，旧社会历史是歧视讥笑劳动人民的，对刀耕火种的山民和“客族”，称山民或畲民就含有歧视讥笑劳动山民和“客族”的贬意。“畲民”逐渐被作这一民族族体的外称。解放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族平等，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称山民或畲民就变成对劳动山民和客族尊敬的褒意称谓。这就是新旧社会不同阶级不同的劳动观和民族观，在同是“山民”或“畲民”却有褒贬的不同含意。如此在畲族歌谣中，唱出对新旧社会民族关系截然不同的歌词内容。如：旧社会唱的是“日来不比当年（指高辛）时，受尽财主汉佬气，田地开出被霸占，只好漂游别处去。”“汉佬若凡合得熟，老虎也能当马骑。”而新社会唱的是“共产党呢真英明，民族政策得人心，族大族小都平等，祖国合似大家庭。”“日头出来照廊前，照得畲家红艳艳，畲村有了共产党，山客日子亮又圆。”前后反映民族关系质的根本变化。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调查，中央人民政府于1956年正式把“畚族”确定为这一民族的名称。从此，山哈歌言便有畚族歌谣称谓。值得一提的是，畚族人对某些不是用畚语和畚族歌体创作的所谓“畚歌”“新畚歌”，说是唱不来，不平（不押畚语韵），或说那不是“山哈歌”。为此，笔者本文的畚族歌谣称谓，不包括那些非畚歌体创作（畚族不承认）的“畚歌”称谓。

歌谣，在中国诗史上是分开的，一般指民歌民谣两类。《诗经·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注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因《诗经》都是乐歌，只是乐曲没能记录流传下来，毛诗注是对《诗经》曲合乐而言的。但若以“合乐”与“不合乐”（指乐器）来作为歌与谣区别的界说，未免有疑义。因民歌、畚歌都是清唱，不合乐器的。汉乐府也都伴乐演奏，歌和谣也是分开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明确标示：“谣歌诗”、“谣歌诗声曲折”，并且记叙了汉代立乐府采歌谣史实：“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些都说明歌与谣自古从《诗经》至《乐府》是分开的。其社会功能，历来也为人们所熟知和重视。只是封建统治者采歌谣，是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而马列主义者的根本观点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听人民歌声，为人民服务是最高宗旨，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歌与谣，其主要区别当在哪里呢？如何界定才是比较科学的呢？民歌与民谣源远流长，两者都是劳动人民世代创作并流传的口头韵文作品。我认为这种口头创作传承的前提特征——口头性，自应成为歌与谣的实践检验，才能分明其界

说。当那韵文的“词”，通过人们口头语言发出“声音”来，便就显出有音乐旋律歌唱与无音乐旋律念讲的区别。即：民歌是有曲调歌唱出来的（通常叫清唱，六朝新乐府称“清商”，与合不合乐器无关紧要）；民谣是没有曲调但有一定的节奏，以口语念讲出来的（其中包括一种既像念讲又有简单音律拖腔吟诵出来的）。两者都没有伴合乐器演奏。简而言之，歌与谣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有曲调唱的韵文为歌，无曲调念讲的韵文为谣。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盖凡民歌，差不多都是‘徒歌’的。”《初学记·采部上》引韩章句：“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朱自清《中国歌谣》解释：“章、乐章也”，“无章曲，所谓‘徒歌’也。”高亨《诗经今注》：“唱有曲调为歌，唱无曲调为谣。”显然，这几种解释，是比较科学和符合实际情况的。

畬族人对歌谣也是分开的。“歌”通常自称“歌言”，都用本族歌调清唱，如闽东畬歌有较普遍通用“福宁调”，还有“霞浦排歌调”、“福鼎调”、“罗连调”等；“谣”，通常称“令诗”、“令”或“令书”、“诗”，用畬语（山哈话）念讲或吟诵，如《佳期酒令诗》、《上中梁喝诗》等。唯畬族童谣，虽名曰谣，有念讲的，亦有用畬歌调清唱的。另在极个别的仪式歌中，以念讲吟诵为主，中间却穿插歌唱，如《请田公元帅咒》。这就是说，若单纯从“词”的角度看，“谣”亦可称“歌”，且“歌”“谣”都可称“诗”或“诗歌”。于是，畬族歌谣的歌题，就有把歌称“诗”、把谣称“歌”或“诗”的情况。

“山哈”“歌言”及其序歌“王风头”名称由来考：

“山哈”：是畬语shang hā音译，是畬族自称。较早见译于《畬族简史》，后多沿之。本文和“集成”亦沿音译“山

哈”用字。但据我了解，shang hā音本是“山客”，自认是中原迁来居住山区的一支客族，正如“客家”来自中原亦称“客”。尚有几种音译：如“山夏”，说是后来生活在越区山地、祖源是中原古代夏人南下的一支族人。“山铃”，铃乃金属元素，取金木水火土之金字，金合而成“山铃”音。

“三合”，意是高辛帝时盘、蓝、雷或蓝、雷、钟三姓为主结合成的一支山民族体。

“歌言”及其序歌“王风头”：考其词名，由来甚古。《诗经》十五国风的“风”，如《陈风·月出》、《王风·采葛》等即十五个地域的“民歌”。在《诗经》之前的歌谣，通称古谣谚，《说文》把“谣谚”释为“传言”。可见“歌言”的言沿用之古。《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风以观民俗。”朱熹《诗集传·序》：“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由此可见，畬族“歌言”一词的“言”字，古义有据，由来久远；畬族序歌《王风头》的“风”即民歌，保留着《诗经》以前畬族源自“河南夷”对民歌的古老名称“风”。至今畬族男女盘歌的序歌《王风来聊》或《王风头》歌词有：“王风头呃王风头，王风内里起歌头，从细未坐王风夜，坐朗王风心怪愁。”“王风歌子百二条，唱那六十就放掉，谁人唱得王风尽，唱尽王风嘴也燥。”借此，提得一提的是，至今人们（亦有畬族文人歌手）和书刊报纸，皆把畬歌“王风”误写成或误说成“黄蜂”，黄蜂乃剧毒之蜂矣！何以类歌？我想，可能最早是由于畬族语“王风”与“黄蜂”谐音造成以讹传讹，也就长期沿为“黄蜂”。加上有的对“黄蜂头”乱加解释，后人就更难发现畬歌《黄蜂头》名称有误和本是《王风头》的原字义了。如今在东南

沿海省的畬族“歌言”，何以还保留着古代中原我国诗歌源头古谣谚被释称的“言”，以及距今3000年前商周中原民歌称“风”，即《诗经》风、雅、颂的“风”——如此古老典雅的民歌称谓呢？解释只能寻畬族源头，本是来自古代中原，畬族是古河南高辛夷裔也。

畬族歌源初步探寻

畬族流传至今的“山哈歌”，是畬族人用本族流传的“山哈话”和“山哈歌调”并用其传统特有的假声唱法盘唱的。面对这种典雅古朴独特的一个民族歌谣艺术，我想从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原因两方面，对畬族歌源进一步作些探寻。

畬歌发生的时间：

从时空的纵向看，可以有如下说法：（1）作为畬族这一民族，其歌谣源发生的时间，应当只能远溯到形成“畬族”共同体的民族祖先承继歌谣艺术的时候。（2）畬族歌谣无疑是中华民族歌谣有机组成部分，是植根于伟大祖国悠久灿烂文化的渊源，还应当远溯到劳动生息在中华大地的中国黄种人最早祖先口头创作的时候。（3）不同地域、种族最早祖先，都称人类的祖先，人类歌谣艺术发生时间，应该追寻到人类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祖先群口头艺术简单创作的时候。孔颖达《毛诗正义》序中：“诗理之先，同夫开辟。”就是说最先最早的诗歌，是在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了。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歌咏所兴，自生民始。”英国诗人雪莱在《为诗辩护》中：“自有人类便有诗。”都确认诗歌艺术发生的时间，是在人类最早祖先的时候。

探寻畬族歌源，从时空上笼统作上述的如是观，我想当

无可非议。不然的话，何以世界各地的语言千差万别？何以有只属于这一民族的诗歌艺术？以及何以有东、西方文艺之称以及各国、各地区、各民族诗乐舞之别呢？

诚然，为具体探寻畚族祖先形成本族歌谣的时间，自当先了解中华民族祖先也是人类祖先发生歌谣的时间。

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发现，是对人类起源问题的重大贡献，它沉重打击了“上帝创造人”的谬论。但“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科学地说明了人类起源问题。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①，分析“从猿到人”发展过程，创立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伟大理论。距今约一、二千万年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丛林地区，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这古代类人猿向人转变的时候，恩格斯称它们是“正在形成中的人”。

人类从动物界变化而来的时候，以采集野生果草为生，群居。开始是不制造石器，经历漫长的采集经济时代。在劳动生活中开始产生思想和极其简单的呼号语言，这种发自喜、怒、哀、乐、惊、惑、急等思想感情的声语音，不一定有节奏，却是最早的声乐和诗歌，加之手势等动作表示，就是最早的歌舞。

1929年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洞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五十万年前，处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了工具，出现了用火。1963年于陕西省西安东南蓝田地区发现“蓝田人”，亦距今

^①《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5页。

五、六十万年前。1965年于云南省昆明西北元谋地区发现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前，已使用石制工具（当有木工具），还有炭屑和烧骨，是用火的遗迹。在国外，1891年于印尼爪哇发现“爪哇猿人”。1954年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发现“阿拉特猿人”。1960年于坦桑尼亚发现“舍利猿人”。距今最早要算1976年在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南猿“露西”，距今370万年前，世界古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公认是人类的始祖。我们从许多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便可知道，人类祖先是三百多万年前形成的。自有人类，便有简单的语言，简单的音乐、诗歌和舞蹈的发生了，这是人类艺术最早发生诗乐舞的时候。此后才有拍手节奏和简单的打击乐（用石头、木头碰击）节奏发生。至于简单的绘画、雕塑艺术以及语言有所发展后的神话等，也都是以后才发生的。猿人以后分化出一支尼人，距今10万年到20万年以前。1856年于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是尼人典型。后来在亚、非、欧许多地区都发现尼人化石。我国南北方都发现尼人，有广东韶关的“马坝人”，湖北长阳的“长阳人”，山西汾河的“丁村人”等。尼人又分化出早期智人，距今约3万年到10万年前。智人不仅分布亚、非、欧广大地区；而且分布美、澳两洲，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智人化石最早发现是1868年法国的“克罗马努人”。在我国有周口店“北京猿人”所在地山顶发现的“山洞人”，还有四川的“资阳人”，广西的“来宾人”、“柳江人”等等智人。由于人们所处的劳动生活环境不同，如地带、气候、温度、阳光等方面的差异，长期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于是从智人中又分化出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种族，也产生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歌谣艺术。各族古歌《历朝歌》：